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4.01.006

基于战略柔性与技术能力影响的 制度支持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林亚清¹ 赵曙明²

(1.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2. 南京大学商学院)

摘要: 以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首次基于战略柔性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制度支持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了技术能力这一重要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对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江、东莞以及佛山等 10 余个城市的 300 家企业 600 名高管进行问卷调查,最终获得了 186 家企业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制度支持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绩效,并且战略柔性在其中发挥了完全的中介作用,而技术能力在制度支持和战略柔性的关系中则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考虑战略柔性和技术能力这两个重要因素可以更好地阐释制度支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这为制度理论在获取企业竞争优势中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制度支持; 战略柔性; 企业绩效; 技术能力

中图分类号: C93, F27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4X(2014)01-0046-09

A Study on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LIN Yaqing¹ ZHAO Shuming²

(1.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2.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resource based view (RBV), the study first explor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firm performance. We investigate 600 executives from 300 companies located in more than 10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volving Guangzhou, Shenzhen, Zhujiang, Dongguan and Foshan etc. Finally, with 186 valid samples, we find that institutional support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 plays the fully mediating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Furthermor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significant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 The study shows that we can better explain how institutional support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by taking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to consideration, and our empirical results provid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gain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support; strategic flexibility; firm performanc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将直接影响企业能力的培养与绩效的提高^[1]。不少研究指出,外部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和“源泉”^[2,3]。尽管学者们日益认同宏观制度环境在

微观企业行为和绩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对于制度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发挥作用的问题依然缺乏深入的研究^[3]。近年来,制度支持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所谓制度支持,是指政府部门以及行政监管机构对企业提供的各种

收稿日期: 2013-02-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71332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面上项目(711720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71102058);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2YJC630321);江苏省 2011 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11_0057)

政策支持,包括资金、信息、技术、许可证以及经营自主权等诸多形式^[4]。遗憾的是,目前鲜有实证研究检验制度支持对企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以制度支持为切入点,探索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制度理论的研究文献。

在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的经济背景下,战略柔性作为一种典型的组织能力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5]。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战略柔性等能力的形成需要大量的资源予以支持。这些资源除了来自企业内部积累之外,也受到了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1]。已有研究聚焦于从内部资源的视角考察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因素,但是制度支持作为一种外部“资源”是否同样会影响企业的战略柔性呢?同时,资源基础观还强调战略柔性这类组织能力对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AMIT等^[6]认为,战略柔性等组织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将所拥有的“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中介物”的作用。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制度支持作为一种企业外部“资源”是否会通过战略柔性这一“中介物”来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此外,技术能力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重要资源,有助于增强企业战略柔性。那么,企业技术能力高低是否会影响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的关系强度?

本文以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以186家中国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战略柔性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制度支持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了技术能力这一重要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制度支持与企业绩效

NORTH^[8]将制度定义为社会运行的规则,认为它是一种人为规定的限制,旨在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制度(如法律和法规等)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1],而政府在制度的制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特别是在许多转型经济国家中,市场机制尚不成熟,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拥有对大量关键资源的控制权和分配权^[9]。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能否获得政府部门以及行政监管机构的制度支持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

XIN等^[10]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转型经济国家中,这种制度支持可以弥补制度不完善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PENG等^[7]强调,在不发达的要素市场中,制度支持对于企业的发展尤其重要,因为它不仅可以降低经营风险,而且能

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资源匮乏问题。可以说,制度支持既是企业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也是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1,4]。一般来说,良好的制度支持有助于企业获取更为丰富的外部资源,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地优化其所拥有的资源,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制度支持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

所谓战略柔性,是指组织能够快速识别外部环境的重要变化并做出反应,及时地改变原有的战略决策,将资源投入于新方案以响应变化的组织能力^[5]。随着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多变,越来越多的理论界与实务界人士认为,企业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柔性来及时调整企业战略进而获取竞争优势。资源基础观认为,战略柔性作为一种组织能力其培养与发展往往依赖于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以往关于战略柔性影响因素的国外研究侧重于考察企业内部资源(如生产技术、信息系统和企业文化等)与战略柔性的关系^[12,13],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外部环境对于战略柔性的重要影响。

在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外部环境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大于西方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忽略制度因素对企业的影响显然是不恰当的。理论上,获得制度支持的企业通常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技术、资金、许可证以及经营自主权等相关资源,这些资源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14],从而增强了企业的战略柔性。比如,赢得制度支持意味着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关于外部经营环境的信息,这有助于丰富企业的决策依据并加快企业调整战略决策的速度^[15];取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以及进入某一行业的许可证,使企业掌握了更多的柔性资源,从而拥有更丰富的战略选择;而经营自主权的支持,更是激发了企业领导者自主经营意识,使得企业实施战略柔性成为可能。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制度支持为企业战略柔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背景,可以为企业实施战略柔性提供更为丰富的决策依据以及资源方面的支持。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 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1) **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 越来越多的研

究证实,战略柔性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是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源泉^[13,16]。SANCHEZ^[16]认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战略柔性,及时调整企业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企业坚持“战略承诺”的神话将渐渐地被“战略柔性”的逻辑所取代。DAS 等^[17]进一步指出,拥有较高战略柔性的企业可以通过快速调整企业战略和重新分配资源来迅速地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响应,及时地把握外部机会,降低企业的生存风险,从而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诸多国外实证研究显示,良好的战略柔性对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8,19]。针对中国的研究,学者们也获得了类似的结论。比如,王永贵等^[20]、杨智等^[21]实证研究都发现,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关于制度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黑箱”,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3]。OLIVER^[1]敏锐地指出,将资源基础观与制度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将有助于学者们更好地解释持续竞争优势的产生。战略柔性在制度支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可能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一方面,战略柔性是一种重要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在复杂环境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在资源基础观中,战略柔性可以被看作是运用与整合资源来实现组织目标和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能力,在企业“资源”与“竞争优势”之间充当了关键的“中介物”角色^[6]。另一方面,制度支持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是企业所拥有的重要制度资源。获得制度支持,通常意味着企业能够从外部环境中取得更多的信息、资金和技术等资源,从而为战略柔性提供支持。因此,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理论视角,本文认为战略柔性是能够有效地整合制度支持所带来的资源的一种组织能力,有助于企业在复杂环境中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最终帮助企业提高绩效。换言之,制度支持是通过促进战略柔性这一重要的组织能力的形成来影响企业绩效的。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 战略柔性在制度支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1.4 技术能力的调节作用

借鉴已有文献,本文将技术能力定义为企业整合、配置、运用各种企业内部和外部技术资源的能力^[22~24]。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研究视角,企业的技术能力被认为是企业所拥有的重要无

形资产。理论上,良好的技术能力有助于企业改进产品的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值以及开拓新的产品市场^[25]。可以说,技术能力是企业重要的组织特征,是衡量企业技术实力的重要指标^[26]。已有研究指出,良好的技术能力为企业战略柔性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因此能够促进企业战略柔性的发展^[12]。

技术能力在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的影响过程中可能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拥有较高的技术能力时,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的关系强度会减弱。理由至少包括如下 2 个方面:①企业用于培养技术能力与获取制度支持的资源是有限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正式制度有所缺失的转型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往往要依靠建立政企关系等非正式制度来获得亟需的制度支持^[10],而这就意味着企业必须投入一定的资源来构建政治关系。与此同时,企业技术能力的建设与维护无疑也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力。在企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鱼”和“熊掌”难以兼得^[27]。换言之,高技术能力的企业由于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培养和发展技术能力而非建立非正式关系,从而降低了制度支持对于战略柔性的影响。反之,低技术能力的企业则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构建政企关系以图获得更多的制度支持,从而大大增加了制度支持对于战略柔性的影响。②技术能力作为一种企业内部资源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关系的强度。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企业战略柔性的培养与发展往往受限于企业所能拥有和运用的内外部资源。在内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企业会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和使用,因为对企业而言从外部获得资源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代价。当企业掌握了较强的技术能力,对于从外部制度支持中获得外部资源的需求和动力会降低,因此制度支持对于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也将随之减弱。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5 企业技术能力在制度支持和战略柔性的关系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即高技术能力会弱化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而低技术能力则强化两者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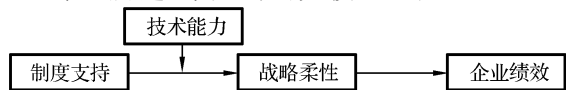


图 1 制度支持与企业绩效: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与技术能力的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通过所在商学院的校友会以及当地相关政府部门获得调研企业的名单和联系方式。调查样本主要集中在广东省,涉及的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江、东莞以及佛山等 10 多个城市。本文主要采用 2 种形式发放问卷:①现场发放并当场回收问卷。调研负责人向调研对象说明了此次调研的主要目的与意义,并对问卷中出现的较难理解的题项进行了解释,在调研对象填答完毕后当场收回问卷。②与政府合作发放问卷。调研人员将问卷装入调研信封,并附上调研目的、意义、填写要求以及注意事项等信息,交由政府部门负责人或联系人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最终由他们通过邮寄的方式反馈给我们。

为了保证数据的质量和避免同源方差的影响,此次调研采用配对样本收集数据。其中,制度支持、战略柔性、技术能力这 3 个变量组成的问卷由企业的总经理填写,而企业绩效的问卷由该企业的副总经理负责完成。换言之,对接受调研的每家企业发放了 2 份配对的问卷。本次调查问卷采用 6 点制来对所有题项进行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历过 2 个月的努力,一共调研了 300 家企业,发放 600 份问卷。最后,剔除答题不完整和无法配对的问卷,最终获得 186 家企业的数据,有效企

业回收率达 62%。其中,企业性质以私营企业为主,占 40.9%,国有企业占 10.2%,外资企业占 39.8%,其他类型的企业占 9.1%。企业规模以 100~500 人的企业为主,占 41.8%,100 人以下的企业占 24.2%,规模在 501~1 000 人、1 001~2000 人以及 2 000 人以上的企业分别占 9.9%、13.1%与 11%。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问卷采用了国外较为成熟的量表。为了保证量表翻译后符合中国情境,量表由精通英语的专业人士和精通战略管理的专家共同完成。此外,在大规模调研之前,还与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充分的访谈与沟通,最终确定了本次调研的问卷。

表 1 为本文主要变量的量表题项。对于制度支持变量,借鉴 LI 等^[4]和林亚清等^[28]所使用的量表,主要包括“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能为本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技术”等 4 个题项。对于技术能力,依据 HENDERSON 等^[23]和蒋春燕^[24]使用的量表,主要设置了“与行业内的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能更成功地结合内部和外部技术”等 3 个题项。对于战略柔性的测量,主要采用 BIERLY 等^[29]与 GREWAL 等^[18]开发的问卷,重点考察了企业总体战略及其职能战略对环境变化的调整,包含了“我们总是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战略”等 7 个题项。值得注意的是,以上 3 个主要变量均为单一维度变量。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与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 (n=186)

因子	测量题项	载荷值
制度支持 (I) Cronbach's $\alpha=0.77$	1. 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能为本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技术	0.77
	2. 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为企业提供了资金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0.78
	3. 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帮助企业获得各种许可,如引进技术	0.85
	4. 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很少对企业的经营进行干涉	0.41
战略柔性 (S) Cronbach's $\alpha=0.89$	5. 我们总是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战略	0.76
	6. 我们总是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资源配置	0.80
	7. 柔性是本公司竞争战略的主要特征	0.74
	8. 我们试图以一种灵活的方式来安排生产	0.73
	9. 我们的竞争战略有了很大的变化	0.69
	10. 我们经常使用不同的营销策略来达成相似的目标	0.78
	11. 我们经常改变运营和投资活动来获得更多的资金	0.61
企业绩效 (F) Cronbach's $\alpha=0.95$	12. 利润水平	0.82
	13. 总销售量	0.88
	14. 总销售增长率	0.93
	15. 市场占有率	0.86
	16. 员工的士气	0.72
	17. 总资产增长率	0.90
技术能力 (T) Cronbach's $\alpha=0.61$	18. 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0.82
	19. 与行业内的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能更成功地结合内部和外部技术	0.80
	20. 与行业内的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能更成功地使技术商品化,到达消费市场	0.45
	21. 与行业内的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能更成功地运用现有的技术进入新的市场	0.87

在企业绩效的测度方面,由于被调研企业往往不愿意披露客观的绩效指标,而已有研究发现高管对企业绩效的主观评价与客观绩效高度相关^[30]。因此,本文采用高管团队成员对企业绩效的主观评价来代替客观的绩效指标。具体而言,使用了 WANG 等^[31]开发的 7 项指标量表来测量中国背景下企业的主观绩效。该问卷要求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客观地评价过去 3 年本公司与同行业竞争对手在“利润水平”等 7 个企业绩效指标方面的优劣。同样,此变量也为单一维度变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借鉴 SANCHEZ^[12]和 XIN 等^[10]的相关研究,本文主要控制了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其中,企业产权性质被划分为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 2 类,以非民营企业为参照组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对于企业规模,根据企业的人数等级设置了一个连续变量,共划分为 100 人以下、100~500 人、501~1 000 人、1001~2 000 人和 2 000 人以上 5 个等级,按上述等级排序分别对企业规模变量赋值 1~5。

2.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17.0 和 AMOS 17.0 进行所有的统计分析,主要包括:①采用 AMOS 17.0 对主要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而考察所使用量表的区分效度;②运用 SPSS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变量相关性分析;③采用中介回归分析考察战略柔性在制度支持和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④运用层级调节回归方法检验技术能力在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我们首先对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见表 1 和表 2)。在信度检验方面,本文所使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均超过 0.6,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见表 1)。在效度检验方面,与已有文献一致,本文主要检验了变量的区分效度。因此,对制度支持、战略柔性、企业绩效和技术能力组成的四因子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题项的载荷见表 1,拟合度指数见表 2。

四因子模型中所有因子载荷数值大多远远高于 0.4 的一般建议标准,这表示同一因子下的测量题项能有效地反映出同一构念。进一步地,理论上 RMSEA 小于 0.1 而 TLI 和 CFI 越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区分效度($n=186$)

模型	因子	χ^2	df	χ^2/df	RMSEA	TLI	CFI
模型 1	4 因子: I;S;F;T	451.65	183	2.47	0.09	0.87	0.90
模型 2	3 因子: I+S;F;T	609.02	186	3.27	0.11	0.80	0.84
模型 3	3 因子: I;S+F;T	1 040.62	186	5.60	0.16	0.59	0.67
模型 4	3 因子: I; F;T+S	506.96	186	2.73	0.10	0.85	0.87
模型 5	3 因子: I+F;S;T	732.57	186	3.94	0.13	0.74	0.79
模型 6	3 因子: I;S;T+F	696.49	186	3.75	0.12	0.76	0.80
模型 7	3 因子: I+T;S;F	556.91	186	2.99	0.10	0.82	0.86
模型 8	2 因子: I+S;F+T	849.65	188	4.52	0.14	0.69	0.75
模型 9	2 因子: I+F;S+T	779.41	188	4.15	0.13	0.72	0.77
模型 10	2 因子: I+T;S+F	1 126.55	188	5.99	0.16	0.56	0.64
模型 11	1 因子: I+S+F+T	1 420.37	189	7.52	0.19	0.42	0.53

注:“+”代表 2 个因子合并为一个因子。

接近 1 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越好^[32]。表 2 显示,该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如下: $\chi^2/df=2.47$, $RMSEA=0.09$, $TLI=0.87$, $CFI=0.90$ 。可见,四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标均达到了较高的标准。同时,与其他 10 个模型相比,该四因子模型对实际数据拟合得最为理想,因此本文所使用的 4 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较好地代表了 4 个不同的构念。概言之,本文的问卷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这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主要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 3。制度支持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r=0.27$, $p<0.001$),这表明获得制度支持对企业改善经营业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显示出很强的正相关关系($r=0.51$, $p<0.001$),而战略柔性对于企业绩效也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r=0.37$, $p<0.001$)。整体而言,相关性分析结果初步支持了假设 1~假设 3。同时,表 3 还显示,技术能力与制度支持、战略柔性以及企业绩效也有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47、0.57 和 0.34,显著水平都在 0.001 以下。当然,上述单变量分析结果并未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为获得更为稳健的实证证据,接下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分析($n=186$)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制度支持	战略柔性	企业绩效	技术能力
制度支持	15.29	3.56	1			
战略柔性	30.37	5.66	0.51***	1		
企业绩效	28.64	6.59	0.27***	0.37***	1	
技术能力	12.50	3.78	0.47***	0.57***	0.34***	1

注:***表示 $p<0.001$,双尾检验,下同。

3.3 制度支持与企业绩效: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检验

根据 BARON 等^[33]提出的检验中介变量的 4 个回归方程,考察战略柔性在制度支持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否具有中介效应(见表 4)。具体而

言:①检验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是否具有显著影响;②考察制度支持对企业绩效是否具有显著影响;③检验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是否具有显著影响;④如果前3个方程成立,继续检验制度支持、

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是否具有显著影响。此时,如果制度支持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减弱甚至不再显著,则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成立。

表4 制度支持与企业绩效: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检验(n=186)

变量类型	战略柔性		企业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常数项	30.14***	18.37***	26.91***	19.94***	13.79***	12.90***
控制变量						
民营企业	-0.39	-0.49	1.92	1.86	2.09*	2.06*
企业规模	0.18	-0.03	0.36	0.25	0.29	0.26
自变量						
制度支持		0.81***		0.48***		0.17
中介变量						
战略柔性					0.44***	0.38***
R ²	0.00	0.26	0.02	0.09	0.16	0.17
ΔR ²	0.00	0.26***	0.02	0.07***	0.14***	0.08***
F值	0.27	20.36***	2.03	5.58***	11.20***	8.48***

注:表中回归系数均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下同;*表示p<0.05,双尾检验。

表4的模型1显示,产权性质与企业规模都不会显著影响企业的战略柔性。进一步地,模型2表明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81, p<0.00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制度支持可以解释战略柔性26%的变异,该结果支持了假设2。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这2个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控制这2个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变量制度支持放入回归方程,结果发现它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8, p<0.001),额外的变异解释量增加了7%(见模型4),所以假设1成立。同时,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4, p<0.001),能够额外解释企业绩效14%的变异量(见模型5),因此该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3。最后,进一步考察制度支持和战略柔性共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6)。研究发现,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8, p<0.001),而制度支持的影响不再显著。依据BARON等^[33]的判断方法,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战略柔性在制度支持和企业绩效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即假设4得到了证实。

采用Sobel检验对上述中介作用进行更为准确的分析。根据公式 $z = ab / \sqrt{a^2 s_b^2 + b^2 s_a^2}$ ^①,其中 a = 0.81, b = 0.44, s_a = 0.10, s_b = 0.08,可以计算得到统计值 z 为 4.55 (p < 0.001),这说明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因此,Sobel检验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4。这意味着,在制度支持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战略柔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制度支持要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必须建立在企业能够通过制度支持获取战略柔性的基础上。

3.4 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技术能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了检验假设5,采用阶层调节回归(HMR)分析的三步骤检验方法,并利用变量的交互项来检验调节效应。如果加入交互项的时候,ΔR²是显著的,那么调节效应存在。具体而言,采用以下步骤进行实证检验:①检验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的影响;②考察制度支持和技术能力共同对战略柔性的影响;③将制度支持、技术能力及两者的交互项加入方程,检验这些变量对战略柔性的影响。如果第3个步骤的交互项系数为负并且显著,那么技术能力的负向调节效应成立。具体实证结果见表5。

表5 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技术能力的调节作用检验(n=186)

变量	战略柔性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常数项	30.14***	15.55***	16.67***
控制变量			
民营企业	-0.39	-0.77	-1.07
企业规模	0.18	-0.07	-0.08
自变量			
制度支持		0.49***	0.46***
调节变量			
技术能力		0.63***	0.62***
交互项			
制度支持×技术能力			-0.80**
R ²	0.00	0.40	0.43
ΔR ²	0.00	0.40***	0.03**
F值	0.27	28.41***	25.03***

注:*表示p<0.01,双尾检验。

根据表4中模型2的实证结果,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表5的模型2研究显示,制度支持和技术能力对企业的战略柔性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β = 0.49 (p < 0.001) 和 β = 0.63 (p <

① a、b分别为中介变量对自变量、因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s_a、s_b分别为a和b的标准误。

0.001)。为了检验假设 5, 进一步在表 5 的模型 3 中加入了制度支持与技术能力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 该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负 ($\beta = -0.80, p < 0.01$), 并且 $\Delta R^2 = 0.03 (p < 0.01)$ 。根据前文中所述的判断方法可知, 技术能力在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二者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即假设 5 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说, 当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较强时, 制度支持对于战略柔性的影响会明显减弱。

图 2 更形象地说明技术能力在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二者关系中所扮演的调节作用角色。无论是在企业技术能力水平高还是低的情况下, 制度支持都对战略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 低技术能力样本组的直线斜率要明显大于对照组, 这说明在企业技术能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制度支持对于战略柔性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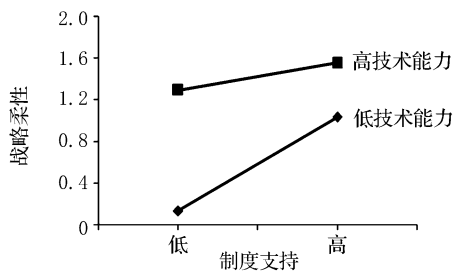


图2 技术能力在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3.5 结果讨论

本研究发现, 制度支持显著地正向影响了企业绩效, 这支持了假设 1。这说明制度支持确实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该结论与 XIN 等^[10]和 PENG 等^[7]的实证结果相一致, 即在转型经济环境下, 制度支持能够帮助企业克服正式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同时, 本文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制度理论所主张的观点, 即制度支持这种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能够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1,3]。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 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假设 2 成立。这一结果支持了制度支持在提升战略柔性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印证了 OLIVER^[1]所强调的观点, 即外部制度环境能够促进企业战略柔性等能力的发展。

本文的假设 3 也通过了实证检验。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战略柔性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的观点, 这与以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论保持一致^[19,21]。进一步还发现, 技术能力在二

者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即企业拥有的技术能力越强, 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的影响会随之减弱, 从而假设 5 成立。这一结果表明, 制度支持确实能够增强企业战略柔性, 但是这种作用受企业自身技术能力的影响。

最后, 本文的实证研究还表明, 战略柔性在制度支持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的作用, 即假设 4 成立。这意味着, 制度支持是完全通过战略柔性这个中介变量来影响企业绩效的。具体而言, 企业往往通过制度支持所获得的资源来培养和增强企业的战略柔性, 并最终提高企业绩效。因此, 上述结论不仅清晰地阐述了制度支持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也验证了资源基础观中关于战略柔性等能力在“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过程中所起的“中介物”的论断^[6]。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 基于战略柔性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制度支持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并进一步检验了技术能力这一重要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广东省内 10 多个城市的 186 家企业样本, 实证研究发现制度支持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绩效, 并且战略柔性在其中发挥了完全的中介作用, 而技术能力在制度支持和战略柔性的关系中则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鉴于此, 将战略柔性和技术能力这 2 个重要因素纳入考虑无疑有助于更好地厘清制度支持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这也为制度理论应用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4.2 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 在“新兴加转型”的中国, 全面地认识制度支持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启示。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 首先, 检验了制度支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证实了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支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理论作为战略管理领域新兴的研究视角正日益受到关注, 但相关的实证研究还十分有限。本文以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为研究背景, 提供了外部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绩效的经验证据, 也丰富了制度理论的相关实证研究。其次, 本文较早地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探讨了制度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 本文首次将战略

柔性这一典型的组织能力用于揭示制度支持究竟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从而在制度理论研究领域为“资源-能力-竞争优势”这一资源基础观中的基本逻辑链条提供了实证依据,即制度支持完全通过增强企业战略柔性来提升企业绩效。可以说,本文以战略柔性作为中介变量来探索制度支持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更好地揭开制度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黑箱”,并且为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2种不同理论视角的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战略柔性前因变量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推进制度支持影响战略柔性的重要边界条件研究。以往关于战略柔性的前因变量主要集中在对企业文化、信息系统和技术等内部资源的探讨上,而往往忽略了发展战略柔性同样亟需的外部制度资源因素。本文研究发现,制度作为背景条件,直接影响到企业能力(如战略柔性)的发展;且技术能力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负向调节作用。该研究结论不仅将战略柔性的前因变量由企业内部因素拓展到外部制度环境,也为深入剖析外部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战略柔性找出了一个重要的边界条件,补充了已有的制度与战略柔性相关文献。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政策的制定以及政府制度的完善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它们必须更全面地认识制度环境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采取有效的方式(如政治网络行为等公司政治行为)来管理企业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28],从而为发展企业战略柔性以及提高企业绩效提供重要的制度资源。另一方面,本文研究发现,制度支持和技术能力对于战略柔性的影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制度支持对企业战略柔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企业依然必须重视自身技术能力这一内部因素的建设,因为制度支持作为一种外部环境因素毕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同样意义深远。在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对于资源分配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因而获取外部制度支持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些制度支持往往存在许多随意性和人为的可操作性,这引发了企业的政治行为^[7],甚至是“寻租”活动,并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所以,为了使制度支持更多地体现政府政策的导向以及合理的资源分配,政府必须更加有力地推进制度支持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4.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①所调研的186家样本企业均来自广东省,虽然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具有代表性,但是取样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企业的地域调查范围和调查数量。②直接引用了LI等^[4]、林亚清等^[28]在研究中国企业的制度支持时所使用的量表,由于该量表只有4个题项,可能难以全面地衡量制度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中国情境设计更加有效的制度支持量表。③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所采用的企业绩效衡量指标是主观绩效指标而非客观绩效指标,虽然这2个绩效指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30],但前者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客观绩效指标或者同时考虑2个绩效指标来进行考察,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④所使用的样本数据为横截面数据,这使得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数据或者案例研究的方式来进一步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

参 考 文 献

- [1] OLIVER C.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and Resource-Based View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9): 679~713
- [2] BRESSER R K F, MILLONIG K. Institutional Capit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Light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 Theory [J]. Schmalenbach Business Review, 2003, 55 (3): 220~241
- [3] PENG M W, SUN S L, PINKHAM B, et al.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s a Third Leg for a Strategy Tripod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9, 23(4): 63~81
- [4] LI H Y, ATUAHENE-GIMA K. Product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 (6): 1 123~1 134
- [5] SHIMIZU K, HITT M A. Strategic Flexibility: Organizational Preparedness to Reverse Ineffective Strategic Decis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2004, 18(4): 44~59
- [6] AMIT R, SCHOEMAKER P J H. Strategic Assets and Organizational R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14(1): 33~46
- [7] PENG M W, HEATH P. The Growth of 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6, 21(2): 492~528
- [8]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9] MCMILLAN J. Markets in Transition[M]//KREPS D M, WALLIS K F. 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vol.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0~239
- [10] XIN K R, PEARCE J L. 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 (6): 1 641~1 658
- [11] HANSEN H, RAND J, TARP F. Enterprise Growth and Survival in Vietnam: Does Government Support Matter?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9, 45(7): 1 048~1 069
- [12] SANCHEZ R. Strategic Flexibility in Product Competi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16 (s1): 135~159
- [13] HITT M A, KEATS B W, DEMARIE S M. Navigating in the New Competitive Landscape: Building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21st Centu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998, 12 (4): 22~42
- [14] BOWMAN E H, HURRY D. Strategy through the Option Lens: An Integrated View of Resource Investments and the Incremental-choice Proc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3, 18 (4): 760~782.
- [15] PALANISAMY R.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Planning Model for Building Flexibility and Success [J]. Industrial Management, 2005, 105(1): 63~81
- [16] SANCHEZ R. Preparing for an Uncertain Future: Managing Organizations for Strategic Flexibility[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1997, 27(2): 71~94
- [17] DAS T K, ELANGO B. Managing Strategic Flexibility: Key to Effectiv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General Management, 1995, 20(3): 60~76
- [18] GREWAL R, TANSUHAJ P. Building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for Managing Economic Crisis: The Role of Market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1, 65(2): 67~80
- [19] NADKARNI S, NARAYANAN V K. Strategic Schemas,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dustry Clockspeed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3): 243~270
- [20] 王永贵, 荆金刚, 李元. 战略柔性 with 竞争绩效: 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J]. 管理科学学报, 2004, 7 (6): 70~78
- [21] 杨智, 邓炼金, 方二. 市场导向、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J]. 中国软科学, 2010 (9): 130~139
- [22] AFUAH A. Mapp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into Product Market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Case of Cholesterol Drug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2): 171~185
- [23] HENDERSON R M, COCKBURN I. Measuring Competence: Exploring Firm Effects i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15 (s1): 63~84
- [24] 蒋春燕. 技术资产与配置能力的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新兴企业的实证分析 [J]. 南开管理评论, 2008, 11(2): 92~100
- [25] COOMBS J E, BIERLY P E. Measur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Performance [J]. R&D Management, 2006, 36(4): 421~438
- [26] TSAI K H.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on Firm Performance in Taiwan's Electronics Industry [J].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04, 15(2): 183~195
- [27] 杨其静. 企业成长: 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 [J]. 经济研究, 2011, 46(10): 54~66
- [28] 林亚清, 赵曙明. 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和战略柔性——恶性竞争的调节作用 [J]. 管理世界, 2013 (4): 82~93
- [29] BIERLY P E, CHAKRABARTI A K. Technological Learning,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J].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1996, 43(4): 368~380
- [30] DESS G G, ROBINSON R B. 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Absence of Objective Measures: The Case of the Privately-Held Firm and Conglomerate Business Uni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5 (3): 265~273
- [31] WANG D X, TSUI A S, ZHANG Y, et al.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3, 24(5): 511~535
- [32] 荣泰生. AMOS 与研究方法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 [33]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 173~1 182

(编辑 杨妍)

通讯作者: 林亚清(1982~), 女, 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福建省厦门市 361005)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和公共管理。E-mail: linyaqing@163.com